

幽默的趣味儿

聊斋闲品

幽默的趣味儿

周振国

按林语堂先生的说法,幽默就是要有幽默感,“愈幽默而愈妙”。譬如林黛玉打趣贾宝玉。《红楼梦》第三十一回:宝玉对袭人笑道:“你死了,我作和尚去。”黛玉将两个指头一伸,抿嘴笑道:“作了两个和尚了。我从今以后都记着你作和尚的遭数儿。”宝玉听了,知道是点他前儿的话,一笑便罢了。

但如果幽默不幽默,或幽默不幽默,彼此缺乏互动和默契,或幽默不庄重、不严肃,失了分寸感,或玩笑了过头,那便失了幽默的趣味儿。

越剧《十八相送》里,祝英台用“芍药共牡丹”“鸳鸯”暗示不灵后,又借一对大白鹅说事:“雄的就在前面走,雌的后面叫哥哥。”梁山伯:“不见二鹅来开口,哪有雌鹅叫雄鹅?”祝英台:“你不见雌鹅对你微微笑,她笑你梁兄真像呆头鹅。”梁山伯:“既然我是呆头鹅,从今你莫叫我梁哥哥。”——一个用心良苦,一个全然蒙圈!也难怪,称兄道弟同窗三载,谁能想象对方竟是女儿身?这要是幽默有幽默有点邪了,但戏剧耍的就这效果。

林语堂在武汉编《中央日报》时,曾就男女问题以“毛驴”为笔名与一位署名“小鹿”的作者发生笔战。“小鹿”褒女贬男,“毛驴”则反之,笔战激烈,一时纸贵。当时副刊编辑是时有“副刊大王”之称的孙伏园,为了结束这场笔战,他特邀“小鹿”与“毛驴”在河口东宴楼相会,谢冰心也被邀作陪,彼此欢饮之后,同意息兵。第二天,孙伏园特于《中央日报》副刊作了一则启事:“男女之争,已于鹿驴交欢声中化除矣!”“小鹿”原是一位小姐,见到这则启事大为恼怒,发誓不再为该报写稿——本来好好的,因孙大编玩过了头,闹了个不欢而散;而在林语堂这边,自然少不得“会心的微笑”一下,倒是幽默有幽默。

传说古代有位秀才,自恃才高,喜欢卖弄。有一天,他和朋友在酒楼吃饭,看到一位女子领着两个孩子经过,于是就起了戏谑之意,便对着女子说:“一羊引双羔。”没曾想这回他遇到了对手,女子瞥了一眼吃饭的俩人,回了一句:“两猪拱一槽。”秀才讨了个无趣,害得跟他一起吃饭的朋友也无辜挨损。

国学狂人黄侃,学问大,脾气大,性格怪,人称“黄疯子”。他反对胡适的白话文运动,也反对西学,因此跟胡适不对付,逮着机会便作践他。胡适著有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仅成上半部,全书久未完成。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讲课时便说:“昔谢灵运为秘书监,今胡适可谓著作监矣。”学生问其故,他说:“监者,太监也,太监者,下面没有了也。”这般胡搅八扯还不算,有一次他在讲课时赞美文言文的高明,便举例说:“若胡适丧妻,用白话文报告消息,其家人电报必云:‘你的太太死了,赶快回来啊!’长达十一字之多。如用文言,则仅需‘妻丧速归’四字即可,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。”为人温和的胡适知道黄侃的疯狂,除了偶尔接他两招,并不真跟他计较,虽然有时被气得要死。

张作霖捉弄日本人的幽默不歇,在国人看来无疑幽默得很,快活得很。因为常和日本人打交道,张作霖便学了几句寒暄用的日语,但据说他只学了三句:“阿里安多”“巴格牙鲁”“沙约娜拉”,即“谢谢”“混蛋”“再见”,这原也没什么,关键是他经常半真半假地用错地方,弄得日本人尴尬又无奈、敢怒不敢言。一次,日本人请张作霖写字,张的书法不怎么样,但还是写了一幅条幅,写完后落款:“张作霖手黑”。副官提醒他,应该是“手墨”,“黑”字下边还有个“土”。哪知张作霖大手说:“我张作霖就是不愿意把寸土送给日本人!”

人拿自己开涮,或对自己嘻哈一点,自然是讨人喜欢的。韩愈赠诗好友刘师服:“美君齿牙牢且洁,大肉硬饼如刀截。我今牙豁落者多,所存十余皆兀鹫。”刘师服看了肯定很受用。启功先生是清朝皇室之后,曾一度不受待见,说的话也总遭人质疑,故而每次讲话之前,他总是以一段自嘲作开场白:“本人是满族,过去称胡人,因此在下所言,全是胡言。”听者会心,一笑便罢。

那船工说:那是。谁不知道泡爷?连河神都让你三分。不料,泡爷的脸色即刻变了,喝道:狗日的,掌嘴!接着,他说:有一年大年三十,我一个人在船上,半夜里,突然从水里伸出一只手,问我要肉吃,给了他,还要。我一恼,就把一锅肉汤泼下去了。你猜咋着?只听“吱哇”一声,我往水里一瞅,妈的,是一根枯树枝子。

康梅文第一次出远门,自然有许多稀罕想看。他看远处大河平阔,一望无际,船来船往,白帆点点。岸边,走上水的纤夫们喊着号子,一声声高亢激越……他禁不住从舱中出来,四下里溜达。在船上转了一圈后,他站在船头,伸手一指,对站在身边的伙计说:哎,帆,你看那帆,歪了。谁知,一语未了,惹恼了那泡爷。只见泡爷操起手边的长篙,一篙把康家大少爷抡水里去了!伙计和船工大惊,叫道:泡爷,这可是货主哇。泡爷黑着脸,骂道:货主?操,货主就不说人话么?让他喝两口黄河水,看他还敢胡耍?康梅文本不会水,一竿子被打进黄河,水流横冲直撞,他还真是连喝了几口黄河水。不过他到底年轻,身强力壮,一阵扑腾,倒也扒叉着露出了头。他往前扒着扒着,刚扑腾有十来米远,就掉进了一个漩涡。下边水流湍急,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似的把人往里吸,越挣扎陷得越深。没来得及“呀”一声,人就没了顶。就在他惊慌失措的当儿,慌乱之间,只觉得脚下的一缕,突然两条大鲤鱼从他脚下窜将出来,接着犹如神助一般,冥冥之中借着这股窜动之力,就像被什么托了一

文化漫笔

杜甫诗歌里的“战争与和平”

王运涛

杜甫作为第一流的历史文化名人,为郑州乃至中原文化高地树立了不朽的精神地标。其诗歌中蕴含的鲜明人文精神和特色文化内容,是郑州文化建设中极富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。“地以人传人以地,拜公遗像颂公诗”。杜甫故里作为世人瞻仰诗圣遗迹的重要场所,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热爱诗歌、追求崇高、崇尚“圣贤”的特定审美眼光、文化心理与精神诉求,日益成为重要的文化旅游目的地。挖掘、研究和传承名扬四海的杜甫文化,打造郑州文化名人特色品牌,推动杜甫文化产业化开发,发挥杜甫文化教导、教育和濡化作用,引导文化旅游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,形成历史文化名人系列产业链,对于当前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,连绵不断的战争成就了杜甫“诗史”创作。一是“安史之乱”为杜甫的诗史创作立基。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,不仅彻底改变了唐朝发展的走向,也彻底改变了杜甫的生命轨迹。杜甫一边在战争的烽火中不停地辗转奔突,一边用他天才的诗歌创作记录个人遭际和时代变迁。如“三吏”“三别”等名篇,均写于诗人在战火中逃亡之际,既反映了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苦难,也展现了杜甫忧国忧民的仁爱精神。由于安史叛军是发起对唐王朝政权侵犯最久、危害最大的主要力量,而杜甫向来支持国家统一,崇尚各民族和平,反对狭隘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反义战争,因此,杜甫诗歌更多地

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安史叛军,表达了对“羯胡事主终无赖”的强烈愤慨。二是唐朝与吐蕃之间的战争为杜甫的诗史创作铸魂。杜甫从乾元二年秋写《秦州杂诗》始,至大历三年秋写《秋日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三十韵》止,十年时间写了以吐蕃入侵为题材的诗四十余首,真实地反映了唐王朝和吐蕃曲折复杂关系的变化历程。由于唐玄宗的穷兵黩武和边将的好大喜功,客观上给黎民百姓带来了沉痛的灾难,杜甫毫不犹豫地将对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唐朝统治者。无论是《兵车行》中对“牵衣顿足拦道哭,哭声直上干云霄”的悲惨情景的刻画,还是在“边庭流血成海水,武皇开边意未已”中蕴含的对非正义战争的愤怒谴责,都生动地反映了被迫应征人民的痛苦,形象地说明了对吐蕃的边战战争不得人心,鲜明地表达了诗人的反战立场。

杜甫漂泊西南时期的生活相对安静平和,在此期间诗歌中常常流露出对真实幸福生活的珍惜和满足,给后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一是偏安一隅享受家庭生活的天伦之乐。无论是“老妻画纸为棋局,稚子敲针作钓钩”(《江村》)的“各美其美”,或是“晒药能无妇,应门亦有儿”(《秦州杂诗》之二十)的全家劳作,还是“花径不曾缘客扫,蓬门今始为君开”(《客至》)的“朋来之乐”,诗人此时的心都是舒展惬意的。二是走近自然感受万物生长的乡野之趣。无论是“留连戏蝶时时舞,自在娇莺恰恰啼”(《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》)对“蝶舞”“莺啼”

的生动刻画,还是“两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”(《绝句》)对“鹂鸣”“鹭飞”的贴切描写,都洋溢着“万类霜天竞自由”的蓬勃生机。纵使千载以后,人们依然记得杜甫的那扇宁静的窗,以及曾经照亮了西岭的“千秋雪”。三是寄身孤舟领受浩瀚星空的壮阔之美。无论是“星垂平野阔,月涌大江流”的漂流之夜,还是“吴楚东南坼,乾坤日夜浮”的洞庭水阔,纵使在漂泊无依的日子里,诗人依然能够不时地感受到天地之壮美,只不过杜甫在山水吟咏中也饱含着对时事的关切。阅读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篇,理解和“咀嚼”其中的“诗心”,可以感受杜甫西南漂泊生活中的生命律动,感受诗人享受天伦之乐的人生至趣,还有对远方战事的羁绊。

杜甫对战争与和平生活的态度展现了其鲜明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一是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的悲悯情怀。与儒家倡导的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”有所不同,“穷年忧黎元”的杜甫“一卧苍江惊岁晚,几回青锁点朝班”(《秋兴八首》),心心念念不忘百姓疾苦,只盼“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,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”(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)。这种“己溺己饥”的仁爱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思想深度,对后来的诗人兼政治家的白居易、王安石等影响很大。二是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的故土情结。杜甫在“九度附书向洛阳,十年骨肉无消息”(《天边行》)的困苦煎熬中,经历了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(《春望》)的焦灼等待,厌倦

了“今春看又过,何日是归年”(《绝句二首》)的孤独无奈,习惯了“思家步月清宵立,忆弟看云白日眠”(《恨别》)的乱世漂泊,内心“寻找家园”的渴望反而越发强烈。三是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”的生命意识。在长期辗转漂泊的生活中,诗人时常被人命如蚁的惊惧和无法把握命运的忧虑紧紧裹挟,由此更多了一份清醒和悲壮。庆幸的是,这份清醒和悲壮非但没有让诗人萎靡,反而让他对身边的一草一木有了更为丰盈的感知和欣赏。如他在《岳麓山道林二奔行》中所说:“一重一掩吾肺腑,山鸟山花吾友于”,直谓起伏的山峦犹如自己起伏的肺腑,山中的花鸟就是自己的朋辈兄弟,表达了诗人眼中万物皆有灵的生命自觉。

“李杜文章在,光茫万丈长”,生活在智媒时代的我们,仍然可以借助诗歌走近杜甫,感受其诗歌中凝缩的儒家精神和道德传统。特别是杜甫在颠沛流离中对国家民族的深切关注,对“战争与和平”的真实记录,不仅集中展现了杜诗的“史诗”特征,也是“诗圣”杜甫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诗意表达,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。如果说“秀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”是诗人余光中对“诗仙”李白的极致推崇,那么“一个人名下的唐朝”则是世人对“诗圣”杜甫的由衷赞叹。杜甫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奔波,在襄阳与洛阳之间眺望,其诗歌呈现出的悲欣交集和家国情怀,无不彰显了强大的文化能量和人格魅力。

诗路放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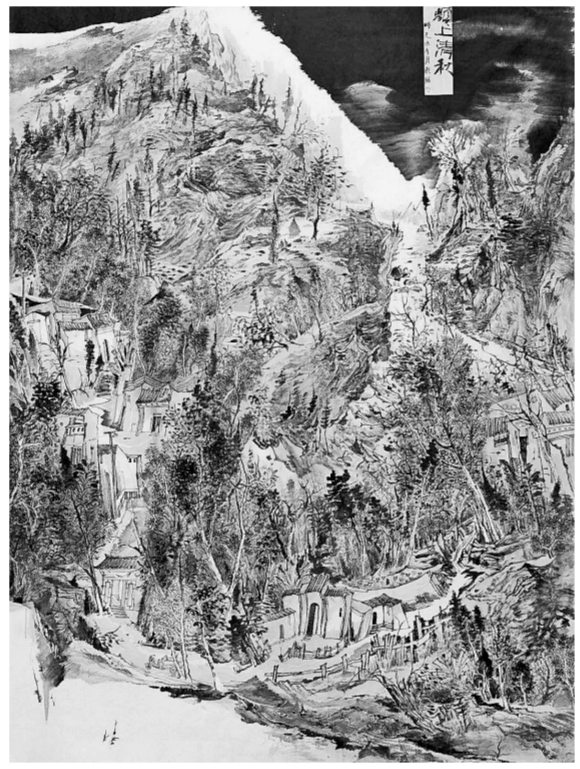
残荷

秦继利

一场霜打之后
焉了,残了
一切都枯萎了
杂乱地低下头
伏卧在平静的水面
无语

残荷中
一些略有淡淡绿色的
或已经干枯的干和叶
在暮色中
竖挺着
坚持到最后一刻
毕竟有过曾经的艳丽与风光
不甘心这样倒下

不过
万物的轮回就是这样
也许,此时的逝去
是一种蛰伏和又一次的积蓄
待到来年
定将是再一次的夺目与耀眼



岭上深秋(国画) 闫彩丽

鞠躬的稻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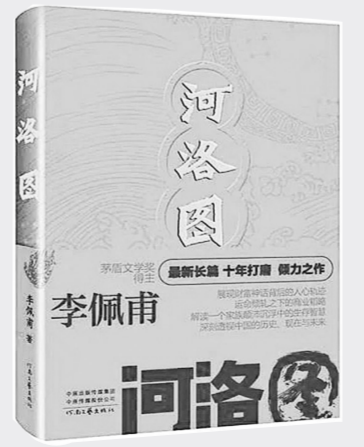
王文平

我捧着芬芳的稻穗
用我一生的收获
扯来清溪的秋风作歌喉
反复吟诵我的祖国

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蓝天
是我纤尘不染的情感
袒露给我的母亲,我的祖国

大地上生长的稻穗啊
是我金黄的十月
每一粒
都是我歌唱的词语
起伏成大江南北的波涛

连载



待抓住船帮,康梅文已是精疲力竭。船工把他像死狗一样拽上来,往船板上一扔,不管了。康梅文就那么躺着,一声声往外呕,吐着满嘴沙土。这时候,伙计拿过一条热毛巾,给康梅文擦了把脸,小声说:少爷,船上忌讳多。你犯了人家的忌了。

康梅文长长地吐了口气,两眼翻白,说:我,知道了。这会儿,泡爷大喇喇地走过来,看了看他,说:康家少爷,黄河水好喝么?康梅文勉强爬起身,浑身淌水坐在船板上,狼狈地说:领教了。泡爷哼了一声,说:比你家霜糟豆腐如何?康梅文说:别是一番滋味。泡爷说:好。倒还有些气概。合我的脾气。说着,他从腰上抽出一个扁葫芦,丢过去,说:喝口,驱驱寒气。康梅文接在手里,说:啥?泡爷说:好东西。康梅文愣了一下,只觉得身子一阵阵地发寒打战。他说谢谢了,拽了木塞,猛喝一口。一股热辣,直抵肺腑。再喝一口,就有了一种回肠荡气的感觉。当康梅文抬起头时,却见泡爷正狡黠地望着他:喝了几口?康梅文说:三口。泡爷突然说:一口一两银子。康梅文怔了一下。泡爷说:你笑啥?这是船上

的规矩。二天擦黑时,船刚刚驶入蛤蟆滩附近,风向就变了。天突然下起雨来,那雨先还下得小,毛毛细雨一样,刺刺的,继而越下越大,大河上,黑沉沉一片,波浪翻滚。再往前,只见河北岸一拉溜停着有十多艘船,船上人在雨中打着灯笼,冲着来船大声吆喝:喂,是泡爷么?泡爷过来了么?泡爷站在船头吆喝一声:操,咋了?对面船上人惊喜地喊道:泡爷,真是泡爷呀!前边就是蛤蟆滩了。就等你泡爷领航呐,走不走啊?泡爷不语。泡爷蹲在船头上,从腰里抽出烟袋,点上一锅烟,吧嗒吧嗒地吸起来。行船的人,最怕过蛤蟆滩。之所以怕蛤蟆滩,是因为蛤蟆滩有一“嚎月石”,民间也有叫“狼哭石”的。这块巨石就立在蛤蟆滩的滩口处,这里水流湍急,行船至此,稍有不慎,就会撞上这“狼哭石”,船毁人亡。“狼哭石”的稀奇险难,在于船过蛤蟆滩时,必须把舵对准“狼哭石”前行,船才能在水流的冲击下,

刚好偏身而过。若有船老大掌舵不稳,心慌手软,稍稍偏上一线,船就会被水流冲得横过来,拦腰撞上巨石,粉身碎骨。故而,大凡船到蛤蟆滩,只要天色一暗,都会在此歇船。等上一夜,等第二天天亮再走。可船工们都知,泡爷可以夜闯蛤蟆滩。传说泡爷有一绝活,在月明星稀的夜晚,只要他用篙尖对一对月亮,那船直得像墨线绷出来的一样。可是,今夜没有月亮。然而,老天却不等人。先是风里渐渐有了寒意,接着西北风突然就“哨”起来了。顿时,天空先是亮了一半,接着是一条银龙炸出了天庭,只听“咔嚓”一声,天地间便是一片汪洋。那雨像鞭子一样喇喇地抽打着,黑黑的浪头山一样扑来,一波一波地啃着船帮,像是抖抖长出了牙齿一般。船开始颠簸起来,船体吱吱呀呀地响着,发出了痛苦的呻吟。那刚靠上的岸顿不见了,只见波涛汹涌,一片汪洋。这时,船下的锚已经不起作用了。若是不走,那船就有相撞或被搁浅的危险。